

大標：Umbrella Revolution 未完成的革命

文/林怡廷

發表於 2015 年 1 月 1 日 想想論壇、當今大馬

2014 年 12 月 11 日，或許是一代香港人心中漫長的告別。

這是雨傘運動最主要佔領區金鐘被清場的日子。75 天以前的 9 月 28 日，10 萬名香港人湧入立法會、政府總部所在的金鐘，要求釋放兩日前率眾衝進公民廣場而被逮捕的學生。

那可能是一場革命初始的樣貌。警方封鎖了金鐘地鐵站，憤怒的群眾從灣仔及中環兩方向湧入，人群從人行道滿溢到車輛疾駛的夏慤道上，佔領逐漸形成。數萬人站在香港的政治中心，港島最重要的主幹道上，共同感受過去香港人內心某種堅不可摧的信仰——法治與秩序被解構的震撼。

在 87 顆催淚彈直撲眼鼻皮膚的辛辣刺痛中，我看著僅僅將保鮮膜包住頭部、克難保護眼睛以阻擋胡椒噴霧的香港年輕人，以及地上不計其數的折翼雨傘。數千名香港人不畏流言，在武警的槍口前等待隔日黎明。

我在清場前晚 10 點抵達金鐘時，大台附近已經擠得無法行走。如釋重負與不捨的情緒瀰漫在現場，「We will be back」的標語以各種形式呈現，像是多聲部復調對位的卡農。勇武派的市民代表宣布隔日尊重學生坐著被捕的決定，許多希望用肉身撞擊出炫爛退場的年輕人，失望於現場的歡快氣氛而默默離開，但依舊有數千人守夜到隔日。

清晨 6 點，我們被接近 10 度的寒意凍醒時，整個金鐘佔領區的柏油路灑滿了七彩亮片，暗暗閃爍，彷彿隱喻垂死或新生前的香港。

清場行動從 11 日早上 9 點開始，75 天佔領而有機形成的夏慤村，在香港警方的高度效率下，不到 12 小時便幾乎回到兩個多月前的如常。我們走上通往添馬公園的天橋，等待真正的結束，75 天前我站在同樣位置看一切發生。

晚上 11 點，夏慤道的兩側再度湧進疾駛的車輛，往港島東面的灣仔方向，以及往西面的中環、半山方向正式全面通車。從天橋望下，一個尚未被清除的公車站頂蓋寫著：「You can't stop us. This is not the end.」

從夏慤道到夏慤村

這場波瀾壯闊的雨傘運動，可以追溯到兩年前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庭的一篇報紙投書。他提出香港過去沒有的「公民抗命」概念，呼籲以「佔領中環」的行動爭取真普選，而後經過漫長、

學院式的審議商討，雖然令許多民主派不耐，卻預先為香港公民社會做思想的鋪陳。

今年6月中，北京公佈《一國兩制白皮書》引發了80萬香港人參與真普選方案公投；受到三月台灣太陽花學運刺激，跨校大學生組織「學聯」宣布提前於七一遊行後舉行的佔中預演，511人坐在渣打公園前的馬路上被抬離時，所有人都深信，8月底人大落閘政改方案後的佔中，最多可能數千人參與。

然而，無法預測性才是歷史的本質。9月22日大學生開始罷課，運動還像是一個閒適的民主嘉年華，9月26日黃之鋒率眾衝進公民廣場被捕，激發了萬人出來要求釋放學生，先前累積許久的社會能量一次爆發。隔日佔中三子宣布提前佔中，9月28日下午，數萬人湧入佔領了金鐘的夏慤道，警方用大量胡椒噴霧及87顆催淚彈企圖驅散人群卻適得其反，隨後旺角、銅鑼灣也被群眾自主佔領。主客觀因素以及內外地緣政治的交纏，雨傘運動被催生出來。

事實上，不曾實踐過的佔領中環，若非經過當局一連串的失誤，也不可能造成雨傘運動的格局。首次對國家暴力有具體經驗，為了保護學生而站出來的香港人，在運動高峰期，有近二十萬人同時佔領了金鐘、旺角、尖沙嘴、中環、銅鑼灣。根據近日的大中民調計算，700萬的香港人口中，估計有120萬人參與過佔領運動，其所引發的政治能量，在最初幾乎撼動了梁振英政權。

但概念提出者的佔中三子，在運動一開始就被邊緣化，927當晚戴耀庭宣布提前佔中時，甚至有許多民眾離開。現場許多人自認出來是為了保護學生而非支持佔中，「佔中三子說得太多了，學生直接行動才有可能。」一個中大學生直率的跟我說。

然而從罷課、突發遊行到中環或梁振英官邸、衝進公民廣場乃至被捕，一路走來對群眾有號召力的學生（主要是大學組織「學聯」及高中生組織「學民思潮」），由於缺乏經驗，在決策上因為怕犯錯而自我限縮，沒能有效掌握運動動能，逐漸喪失對佔領現場的全面領導力。

另一方面北京及香港特區政府學到了教訓，以按兵不動的主調，在唯一一次與學聯五位代表對話後，就關上大門拒絕再次對話，讓運動進入漫長的消耗戰。許多人不滿意「大會」坐以待斃，也因此產生了路線之爭（左膠 vs. 右膠、和理非非 vs. 勇武抵擋），使得雨傘運動的面貌，呈現更為複雜、歧異、去中心化、反大會、反組織的傾向。

另翼旺角 不被理解的抵抗

擁有大台、媒體鎂光燈、明星學生、藝文創作、還有攤位指引圖如遊樂園般的金鐘，是向世人展現香港高度文明的抗爭中心，溫暖美好的烏托邦，而928催淚瓦斯一夜後，群眾自發佔領的旺角，則是邊緣、另翼、紛擾不斷的真实世界。

過去香港的政治／社會運動場域，無論是維多利亞公園、立法會、公民廣場、政府總部、中環渣

打道等，一向是港島中心。處於維多利亞港對岸的九龍，尤其是龍蛇雜處的旺角，這個香港中下階層主要的生活消費場域，不曾在這類集會的考慮範圍。

然而，是旺角自發性佔領的對岸呼應，讓 928 當晚沒跟著大會呼籲撤離金鐘的數千名香港人，有勇氣在槍口前直到黎明。這場偶發的初始，奠定了雨傘運動前兩個月的格局。

旺角佔領區以旺角地鐵站出來的亞皆老街及彌敦道的十字路口延伸，是九龍的交通樞紐。運動初期十字路口全佔滿時，這個比金鐘、中環更具生活感的佔領區，的確對當地商家引起不小衝擊。實際上直到現在，旺角都不是能被主流理解的地方／人。幾乎和金鐘相反，國家越暴力旺角就越壯大。金鐘的菁英特質，和旺角的草根性，使得這場運動不但在世代呈現判斷上的矛盾，階級差異也被召喚出來。

黑社會、反佔中人士的騷擾不斷，不時從高樓扔下的穢物、左右膠的對立，具爭議的本土派團體長期鎮守，被視為激進、好事、逞兇好鬥的蒙面少年...旺角佔領的初期，不斷被香港主流意見領袖認為不入流，在戰略上沒有必要，呼籲盡快撤離，集中火力在金鐘。

但旺角基地的存在，催生出一個有機、多元的群體。他們自我定義為勇武派，多半擁有不清晰的本土意識。在香港 18%的大學升學率的環境下，這些年輕人 20 出頭卻已不是學生，中學畢業後做著一個月 14000 塊港幣以下的低薪工作，卻總是下了班來到現場守夜，直到隔天坐第一班地鐵回家。

這個群體的主體性經過一場場戰役而逐漸堅實。即便遭遇內（運動）外（政府、滋事者）部的雙重壓力，過程中旺角也曾遭遇警方無預警清場，卻在隔日重新佔領回來，展現頑強的戰鬥意志，如同野草般除之不盡。這種抵抗的特性，使得 11 月 26 日被清場後，一度發生激烈的游擊式街頭抵抗，並且迸生了新型態、超乎香港社運想像的抗爭方式：鳩鳴團（購物）。

打開的主體與邊界

如果說「佔領中環」不曾實踐過，便隨著佔中三子 12 月 5 日的自首被徹底拋棄，旺角清場後轉化為「流動佔領」的型態，或許宣示參與者在雨傘運動中，經驗上的真正獨立，以及更加堅實的主體性。

重新檢視雨傘運動的發展，在初期是被動的、意外的，其格局來自當局的錯誤決策。即使兩個月來抗爭者佔領了主要街道，局勢穩定後，香港警察維持秩序的成本低而輕鬆。

然而面目多樣的旺角佔領者卻徹底轉化了運動的本質。鳩鳴團從被動到主動，連口號、方式都脫離傳統香港社運脈絡，轉化成更為自由、創意的在地經驗，讓香港警察疲於奔命。香港政府管治成本增加，即便清場後也無法忽視民間對於真普選的強烈訴求。

但另一方面，抗爭邊界如同潘朵拉的盒子，打開後的自由更自由，引來的暴力也更加暴力。旺角打死不退的被動抵抗，所呈現的硬蕊性（Hardcore），更像 80 年代的台灣街頭，壓抑、混亂、激烈。因為能從肉身的衝撞、犧牲來體現自己在這場運動的存在感，旺角抗爭者更願意承受暴力，也挑戰、打破了過去香港警察對於維護秩序所使用的「合理暴力」邊界。

這種對抗的激化，最後是否會導致保守中產階級的更加退縮，還有待觀察。但旺角的確徹底解放了過去香港人對抗爭的想像——傳統社運圈習慣的合法遊行、集會與公民抗命，引來主流社會「暴力化」的指責和標籤。他們不信任大會，強調自主性，這群迅速竄起、隱然形成的新興力量，多數厭棄主流泛民的溫和路線，在目前的民主派光譜中，缺少實質的政治代理人。

香港人誓將歸來 如何歸來？

「We'll be back」是雨傘運動結束時的主調，符號、訊息、行動，如同回聲無所不在的重現。有時單獨行動，有時合流，形式變化多端，攀岩掛幅、鳩鳴團、報佳音團，各式的流動佔領，或是如雜草重生般不斷復活的列儂牆（Lennon Wall），成了所有抗爭者的默契。

但一群去中心、去組織、拒絕領導的群眾，將如何歸來、以甚麼形式歸來，才能對堅不讓步的當權者產生實質壓力？

過去泛民在香港民主運動的角色不可抹滅，譬如 2003 年反二十三條法案等，泛民在議會仍有重要功能。但近年香港政府已對幾十萬人遊行無動於衷，對近 80 天高強度的雨傘運動展現出的強硬作風，使得溫和的議會路線逐漸喪失支持。在許多抗爭者眼裡，香港民主運動 30 年，傳統的遊行、集會方式並未取得任何實質成果，即便立法議員長毛的抬棺材、拉布等過往被視為激進的行動，都被視為無效、流於形式的表演。

缺乏真正的普選機制，香港特區政府不具備民意正當性的權力基礎，而議會也無法有效反映民意監督施政時，街頭路線成了抗爭者內心唯一可能的出路。

但和台灣過去黨外的脈絡不同，香港民主派並非街頭出身，因此面對雨傘運動如此龐大的街頭抗爭，習慣以議會為戰場的泛民政治人物失去了位置，被視為妥協而不可信任。到後期抗爭者激烈的衝撞，泛民議員與以切割和譴責，也引起許多街頭抗爭派的不滿。另一方面，傳統社運派和理非非路線沒獲得實質成果，已經難以說服這群沒有出路感的年輕人，內部充滿不信任與分化。

事實上，鷹派、去中心化、反大會的傾向在台灣太陽花運動時也存在，無論強調升級、不達目的不撤退的戰略鷹派；或者對民主的邊界想像更為無政府主義，由非一流大學學生在立法院二樓自成的緊密社群「二樓奴工」，他們批判帆廷為首的決策中心「不民主」，但畢竟只是少數。

反觀香港的雨傘運動，去組織、去中心化的特性到後期逐漸影響著運動的走向，不像一般激進派被壓縮到邊緣位置，反而相當程度的蔓延在香港年輕人之間，逼得較溫和的大台學生，在運動滿兩個月後的 11 月 30 日當晚集結群眾，做出包圍政總的行動升級決定。雖然最後失敗收場，那個在龍和道激烈而暴力的一夜，也有數千人參與。

這群年輕人過去不常參與過民主／社會運動，是因國家暴力挺身而出的運動素人，經過 79 天的一場場戰役，實踐出一套屬於自己的抗爭經驗，無論是裝備或語言，警察暴力讓他們的心志更堅定，網路社群更容易在去組織的狀態下集結。但沒有組織的明確目標和策略，導致力量分散。香港民主運動的未來，急需一個足以處理內部矛盾，整合統籌、召喚行動的實質領袖。

告別六四情意結

另一方面，傳統民主派長久以來「建設民主香港為了建設民主中國」的論述已經喪失了時代性。今年 2 月，在港大學生會刊物《學苑》大膽提出「香港民族、命運自決」概念的時任總編輯、政治系的梁繼平告訴我，真正讓他開始思考香港民族論述的起點，正是六四晚會上支聯會的口號，「我發現自己喊不出口。」

「建設民主香港為了建設民主中國」存在於香港八九情意結的一代，以及許多規避政治氣候而來香港定居的中國自由派，卻和 80、90 後香港年輕人內心的真實情感產生斷裂。甚至連六四悲劇的恐懼，對這代香港年輕人而言都是抽象認知，不造成具體陰影，也進而影響不同世代、不同認同對運動策略的判斷。

928 催淚瓦斯那夜，學聯呼籲現場群眾撤離，但兩個 20 歲的年輕人告訴我，他們不相信香港警察敢開槍，就算開槍也不怕，他們做好了犧牲的準備。隔日凌晨，一個 17 歲剛上大學，一頭金黃色短髮，黝黑的俏麗女孩，在前線的槍口前堅定而平靜的跟我說：「如果我們因為子彈就退縮，以後政府都會這麼做。但這樣一來，又和以前的遊行有甚麼兩樣？香港永遠都不可能改變。」

香港要改變，的確已經無法再循過去老路，但新路在哪裡，已成了這代人的共同摸索。

泛民的妥協和保守，逐漸喪失這群新覺醒年輕人的信任，而掌握進步詮釋權的社運派對於階級、社會問題的論述，也無法有效處理高漲的本土意識——其光明面是對民主化的欲求，陰暗面則是升高的族群矛盾。

那些無法被過去框架定義的雨傘世代，因為運動迅速長成、深化了政治意識，他們在佔領現場認識志同道合的朋友，利用通訊軟體形成一個個 30-50 人不等，鬆散的社群。他們有的人已深感沒有適合的政治代理人，積極思考組政團、參政的可能性，下一屆區議會選舉是目標。

無論如何，It's just the beginning。金鐘清場當晚 9 點，最後被抬離的抗爭者，香港工黨、長期

舉辦六四晚會的支聯會主席李卓人，在被帶上警車時，喊了一整天「我要真普選、我要真普選」的口號隱沒在暗淡星光的港島夜空。不久後，無法辨識的遠方也響起同樣的叫喊，不見人影的呼應如山谷的回聲，懸疑、費解讓預備要撤離的警方繃緊神經。

看不見的不代表不存在，我的香港朋友跟我說。香港社會在冷漠、高效、功利主義的外表下，伏流平日難以窺探的炙熱能量，在這次一併噴發。但革命尚未成功，經過具體的實踐經驗，已有了本質上的劇烈變化，也揭示出更多層次的社會肌理，讓未來更加充滿不確知的想像。

秩序感被解構的香港社會將是甚麼模樣？北京是否會更加緊縮？未來泛民的既有板塊會不會分割，不同意識形態的民主派是否能整合？這些都無法在這場未完成的革命得到解答。

或許唯一能夠確定的是，香港正式進入高度政治化的時代。在運動中更加固化的共同體意識，讓最終李卓人的呼叫和遠方的回音，成了香港未來民主運動的重要隱喻：舊的民主 Icon 逐漸淡出，面目不清的新一代正在遠處竄起。與「建設民主中國」分道揚鑣，年輕人喊出「自己香港自己救」，勢將成為未來香港政治運動的主調。#